



故乡、自然、成长,是林子散文的三条主线。怀乡是中国散文自古而今的一个重要母题。以现代散文而言,篇名以“还乡”为关键词的名篇,就有郁达夫的《还乡记》《还乡后记》,倪贻德的《岁暮还乡记》,何其芳的《还乡日记》,茅盾的《还乡记》等;以“故乡”为题的散文,则有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舒新城的《故乡》,茅盾的《故乡杂记》,李辉英的《故乡的山梨》,黄天庐的《忆故乡》,丰子恺的《故乡》,鲁彦的《故乡》,傅东华的《故乡散记》,紫羔的《故乡是只烂桔子》等等;写过《乡愁》《我的乡愁》等题目的游记散文作家则有罗黑芷、倪贻德、叶灵凤、茅盾、柯灵等。

故乡是什么?文学评论家鲁枢元曾经深情叙述:“故乡是一块自然环境,是天空,大地,动物,植物,时光,岁月;故乡是一支聚集的种群,是宗族,是血亲,是祖父祖母、外婆外公、父亲母亲、邻里乡亲、童年玩伴、初恋情人;故乡又是一个现已不再在场的、被记忆虚拟的、被情感熏染的、被想象幻化的心理境域。”事实上,由于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处于农耕社会,生命与土地的密切联结沉淀在人们心灵深处,便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结构,并潜滋暗长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现当代作家大多都有乡村背景,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他们走出故土、步入他乡,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撕扯着他们的情感和灵魂,故而使得他们心灵深处的恋土思乡之情,如许强烈而深厚。

心有千结,故乡梦中来。于是在林子的散文里,我们便看到她对故乡的苦恋。一场腊月小寒节气的雪花,她的笔下也充满温暖的忆念:“起初雪并不大,纷纷扬扬的,落在黄土高原上,随即渗入泥土中。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沟沟梁峁枯干的荒草,被雨浇成了褐黑色,却又有一种湿润的柔软;路边的树杈上,已积起了一指厚的雪苔。正在冬眠的树叶和花蕾,做着甜美香甜的梦,风儿似乎也睡着了。”塞北的凛冽,经了游子

的心灵过滤,竟有了江南风景才有的“清新”“湿润”“柔软”“雪苔”,那“做着甜美香甜的梦”的岂是“冬眠的树叶和花蕾”,那是怀念故乡的人啊。

于是,我们看到她对故乡的痴情描绘:“老人过年热闹而繁忙,一过腊八节就开始泡豆子生豆芽,绿豆黑豆两种皆有,到这会儿豆子应该已发芽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拉开了忙乎过年的序幕,清扫卫生、磨豆腐、蒸花馍米窝窝、炸油糕、做摊黄、剪窗花、写春联、挂红灯、买新衣服、买年画、买花炮……”普普通通的风俗,在时间远去、空间远隔的回望里,有了多少浓浓的情味、悠长的滋味和深长的意味。

当然,怀乡最念是亲人。四五岁时,母亲离去了,“我”成了“父亲的尾巴”。“记忆中的县政府会议室摆放的是长条木桌木凳,我紧挨着父亲坐在长凳上,脚还够不着地,胆怯的眼神儿根本不顾环顾四周。开的什么会我不记得,只记得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带着小小女儿去县政府开会的父亲,会受着怎样的为难,仅仅是因为不敢让女儿一个人待在招待所,便连哄带劝,带着女儿去开会。懵懵懂懂的

路在脚下,光在前方

——读《童年书》 □李一鸣

女儿不顾父亲的脸面,一气之下撒腿跑出会议室,父亲则“紧跟着追”“边撵边喊”,当父亲好不容易追上女儿,女儿“已做好挨揍的准备”,但父亲没揍我,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一起向街上的小摊走去,带我买了一块扭丝饼”。虽是平朴的叙事,不事雕琢的白描,但一个备受生活折磨却真心疼爱孩子的父亲形象,在纸上、在读者心上立了起来。“我”贪睡赖着不想上学,被父亲一把从被窝里拖出来,等“我”到了教室,父亲却跟来,“帮我把布衫套在了背心的外面”,又递给“我”一个用书写纸包着的热乎乎的鸡蛋饼。当“我”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学,“从复试到开学报到,都是父亲领着我,坐七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到校”……父爱温度,人间至情,于此得之。“在我小的时候,一直是父亲的尾巴,多想父亲老了,让他跟着我,当几年、十几年女儿的尾巴啊!”但还没有等到我尽孝时,父亲却匆匆地走了。”最深的深情,最深的遗憾,却淡语出之,尤显沉痛。

林子的怀乡书写,无论是对故里景色的热切追忆,还是对家乡风俗的真切描绘,无论是对故乡的情感倾吐、心灵倾诉,还是深切独语、自我表白,都充满对纯粹生命、纯净人生的向往,浸透着对诗意栖居、美好人性的追寻,其内蕴指向的是建构一种洋溢着人性美丽的精神人格和根自本心的现代文明。

在林子的散文创作中,山水自然书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先秦时代,老子便将“自然”作为其道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的“自然”既是哲学概念,意指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最高法则,又体现为现实的自然山水,庄子则在《逍遥游》中传达了孜孜追求“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自由体验的情怀。魏晋人把老庄抽象的“自然”之道转化到外在的“山水”之间,在他们看来,“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本身”。人在自然世界中和谐自得,在大化流

行中自然而然地运行。到了唐代,唐朝人的山水意识亦突出强调人的本体与山水本体的合二为一,追求物我相亲、物我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在宋代,山水关系已不存在主次之别,而是对应相亲关系,人从形体到心灵都融化于山水之中,获得心理的平静和灵魂的安宁。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然、亲和山水的思维,蕴涵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不断充实、不断注入活力,得以丰富发展并沉淀下来,终于汇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系。在林子的散文中,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摇篮,人类只有回归自然才会寻回天性;而自然一旦进入人的视野,便被赋予人的色彩,“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统一于人类融入自然的精神向度和美学创造。

在《下乡在邵平》中,她饶有兴味地描写眼中的风景:“邵平的小鸟相当多,仿佛此地的山水人文对它们有着某种吸引的力量,各类山雀、云雀以及从来没见过的鸟飞来跑去,到处遨游,并各自吐露着不同的乡音。这些时而来自树端,时而来自水面,时而逼近,时而遥远,随着或远或近、或高或低产生出不同音质的鸟鸣声洒落满地,真是千声万籁,喻然大观。加上水的润泽,风的鼓动,清晨的诗意便蓬勃生起。”在这里,山水自然激发作家情感,作家赋予山水自然以灵性、人格,作家身心完全融化于自然,并在自然之美中神思畅游,在关于鸟的乡音的幻化中达到“眼中风景”与“心中风景”和谐、人情与物景交融的境地。“登上山顶俯瞰,天空碧澄,一尘不染。随着太阳的升起,鸟雀似乎比清晨谦逊了几分,把青翠的啁啾声调得低了一些,柔了一些,稀疏了一些。它们轻逸的身影,点缀于枝叶间草丛中。蝉声随之漫涨,一蝉独唱,万蝉齐和,鸟鸣被一波一波的蝉声覆盖,如微雨缠绵,犹丝竹乱耳。”作家心灵与自然鸟雀处于冥合状态,人的内心世界、生命情致与山水自然形成了一种意趣深远、回味悠长的呼应。在作品中,作家绘写故乡的山水景致:“小

时不识节气,从山的变化读出四季交替。当山下积雪融化,褐色山体显露出,绿色慢慢攀上山顶时,是春天来了;当山顶的银白色向山下漫延,给山体盖上雪白的棉被时,冬天到了。对于我来说,四季就是山的变化。”作家于此把山水当作生命中的“家山”“家水”来描写,山水的“空间”与四季的“时间”如此相互契合,“自然的诗化”与“诗化的自然”达到双向互构,人与自然实现内外和谐统一。当然,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自我”不是消融隐没在自然山水中,而是使山水自然积极地表现着自我,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体验中,生命得以与自然融通,山水实现与自我合一,从而提升了文学对山水自然书写的境界。

林子的作品也映现了作家的成长史。散文本是作者精神的载体,散文写作是作者个体生命经验最自如的倾诉与表达。它饱含作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客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更是作家心灵的真实“自传”。郭沫若曾宣称,“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李素伯认为,文学名著都是“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基本相”。事实上,自我表现是作品的生命,散文作品呈现着作家的生活成长史和精神成长史。林子的散文贯通着自己的成长:孩童时母亲离开的孤独,上小学时心灵的遭遇,读中学时三十里山路的奔波,进入技校时想家的急切,恋爱时父亲的叮嘱,随军的艰苦生活,跨省调动的人生转折,到基层锻炼的心路历程……时间改变了生活,时间创造着生活,时间就是生活。

“行走在那条路上,感觉到来自大地深处的那种无法表达的力量感,会觉得心中的信念正在与大地产生共鸣,指引我通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条路。”是的,这条路连接过往,也通向未来,承载生活,也背负文学。林子,永远保持出发的状态吧,路在脚下,光在前方!

眼睛读懂诗意图还不够

——《九诗人:俄罗斯的太阳与月亮》序

□范行军

2015年和2018年,同在8月,先从沈阳,后自北京,两次启程,行走俄罗斯,行程3万多公里,一路虔敬。就像抵达莫斯科的次日,乘车4个多小时前往图拉州“明媚的林间空地”雅斯纳亚·波良纳,面对绿草丛中“世上最美的墓地”,不由自主地跪下。虔诚不为一人,是对这片精神家园的眷念。

眷念一旦践行,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新的感知。

在特列恰科夫美术馆,画像上的普希金,没有我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那个背影更真实;在凯旋广场,高高在上的马雅可夫斯基,不如我在芬兰湾惊涛拍岸处见到的“22岁”更俊美;在铸造厂大街的书店,叼着烟斗的叶赛宁与安格列杰尔酒店墙上那块“断裂”浮雕叠在一起,定格了生死一瞬间;在鲍里索格列布巷6号,茨维塔耶娃隔壁相望故居,“如果灵魂生来就有翅膀,它不需豪宅,也不需草房”,更显苍凉;而当我从塞瓦斯托波尔的南边跳进黑海,“野丫头”阿赫玛托娃也在水里拥抱波涛,就像她抱着痛苦与光荣。涅克拉索夫、吉皮乌斯、勃留索夫、勃洛克、别雷、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每次不经意或是特别的遇见,都是与历史、时代与诗的相遇,更是与自己相遇。

当我谈论俄罗斯的诗人时,我是在谈论我自己。现在,再加一句:眼睛读懂诗意图还不够,行走的坎坷更靠近人生和命运。

二

所以我不不会颂扬“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克里姆林宫“炮王”和“钟王”处,他那一闪而过的落寞和孤独化作认知:没人可以不为自由付出代价,甚至自尊。

“如果你12月14日在彼得堡的话,你将要做什么?”尼古拉问。

“我将会和造反者一起出现在参政院的广场上。”普希金回答。

1826年9月的那个下午,尼古拉又问诗人:“你的思考方式是否有所改变?是否能够保证今后改变行为,如果我将你释放的话?”诗人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向沙皇伸出了手,发誓会有所改变。于是尼古拉和普希金从房间里走出来,对等候在外面的大臣们说:“先生们,这是我的普希金!”这一刻令人欲哭无泪。我甚至为“偷窥”了诗人的“另一面”而愧疚。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将我从这一情境中拽出。他比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普希金,理解自由与生存:

就这样,前进,不必战栗,

把同类现象当作慰藉,

当你还活着而非一具圣骨,

人世间何曾对你有过怜悯。

三

行走,也是一次自我放逐和流浪,最后返乡回到精神的伊萨卡岛,就像我在普希金的家,在阿赫玛托娃的家,在茨维塔耶娃的家……

走进舍列梅捷夫官后花园,走上阿赫玛托娃家的楼梯,步子沉重,伴着她疲惫的喘息。挨近那些破旧的锅碗瓢盆,还有一只有裂纹的碗、一条白色的披肩、一把破旧的椅子,它们都是带着温度的,连接着诗人的痛苦和寒冷。一盏马灯也被点燃,光亮中,诗在前行。而当我走近一面镜子,和勃洛克、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在一起,就再也无法是一个旁观者:“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传说/谁能拒绝自己的生活呢。”

走在铸造厂大街,已经遇见了涅克拉索夫和叶赛宁,我就想:会不会又相遇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结伴在此悠长地散步。还有勃洛克,还有古米廖夫,还有曼德尔施塔姆……他们不再是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同行者。

不错,在布罗茨基故居楼下,我分明看到1972年,他在离开故乡前站在二楼阳台上,脸色沉郁。我听他说,“从这个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街道”。于是我看这边,又看看那边,丝毫不感陌生。如果说诗人的诗进入了我的生活,不如说是我的脚步走上了诗人的道路。没有无缘无故的追寻。我不喜欢冒险,绝不会看到他在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不是一个局外人。我声明:当初把诗人赶出家门的是列宁格勒,而我也是它的一员。

诗人是一面镜子,不要指望只有光鲜的一面对酒当歌。在镜子背面,月有阴晴圆缺。当我来到布罗茨基的后院,看到城市另一面的同时,也就看到了光环的另一面。

作诗法与做人法是一样的:少些“形容词”,多些“动词”。

四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芬兰湾到福罗斯湾,

从莫斯科河到涅瓦河和丰坦卡运河,从阿尔巴特街到涅瓦大街,从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到莫斯科大学,从基督升天大教堂到圣主显容大教堂,从冬宫广场到普希金文化广场,从舍列梅捷夫官后花园到姆鲁济大楼后院,从皇村到青铜骑士,从十二月党人广场到“流浪犬”俱乐部,从普希金路到莱蒙托夫路,还有叶卡捷琳娜堡、特维尔、列宾诺、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亚美尼亚、巴统、敖德萨……我在九诗人住过的地方、到过的地方行走与遥望,沉思又默想。他们徘徊之地,我徜徉。他们回不去的故土和祖籍地,格鲁吉亚、华沙、圣彼得堡、莫斯科、梁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我能去的,替他们回看;我不能去的,带他们瞻望。那艘船依然洁白,稠李花依然如初,奥卡河水依然清澈。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依然和历史在一起,和时代在一起,和今天在一起。

普希金呼唤自由的声音,不只是十二月党人的呐喊。

勃洛克从“美妇人”处转身面对苦难的大地,痛苦与深情动人心魄。

马雅可夫斯基坦言“我的灵魂里没有一丝白发”,是如此干净和俊美。

叶赛宁痛哭“我是乡村最后一位诗人”,这是一曲忧伤的挽歌……

诗人的命运,无不是俄罗斯风云变幻最为生动的映照。

而诗人虽死,诗歌获得新生,且流浪得更远,仿佛还有“放心不下的事情”。

五

“一切都不寻常,一切都不一样。”默念着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我行走在墓地之间。

那天在新圣女公墓,为了寻找象征派诗人别雷的墓地,在一个区域转了好几圈,最后看到的墓碑比想象中矮很多,旁边那棵橡树倒是又长高了。这之后,看到了寂寞的勃留索夫,就像1923年12月17日,莫斯科大剧院为诗人庆祝50岁寿辰时,这位象征派领袖备感孤独。前来恭贺的诗人很少有人发言,帕斯捷尔纳克朗诵了献诗:

我祝贺您,一如这场合

祝贺自己的父亲那样。

只可惜大剧院里没人会

把草席铺向脚边般铺向心房。

我是通过诗人的生卒年“1873—1924”找到墓地的。我想他活得太短,可3年前离开的古米廖夫比他还小,1年后离开的叶赛宁又比古米廖夫还小。我看着墓碑,想到了圣彼得堡的沃尔科沃公墓,另一位象征派巨匠勃洛克。诗人生得高高大大,墓碑却修长清瘦,如他所预言的“一个骨瘦如柴的鬼”一般清瘦与挺拔,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清瘦与挺拔,是孤傲、是清寂。在他南边,著名的文学家之角,屠格涅

夫、冈察洛夫、库普林……相伴而居。但看着他,刹那间我则更理解了“比水还静,比草更低”,多么显赫一时的,都将随时间的流逝留在历史中,但静水流深,璀璨永存。

“黄金时代”的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丘特切夫、果戈理、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光芒四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主义、意象派……群星闪耀。这一百余年,是俄罗斯文学的鼎盛嘉年华。如果说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俄罗斯帝国荣誉不再,文学开辟的疆域却是繁荣昌盛,诗歌更是光芒万丈。

那么,这与我何关?

关系甚大。

我明白,不论我怎样热爱俄罗斯的诗人,也不可能成为诗人。也许在内心深处,我原本是想成为那样的人,这与自不量力无关,关乎愿景。如今,愿景以另一种形式呈现:我跨越,我奔跑,我行走,去遇见坎坷和诗意,遇见苦难和梦想,遇见命运和光荣,从而认知丰富的世界。丰富包括着不完美,而正是不完美,让我每每急迫之下,得以抓住飞翔的翅膀。站在波罗的海岸边,我想起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尝试赞美这残酷的世界”,看淡了一路的不顺。

每一次跟随诗人的脚步,都能对生命给予一次清醒的判断,尤其是自信。布罗茨基是这么说的:“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而我更是从诗人身上获得了难以被战胜的力量。

六

“在风格打破的时刻,再造的是我们自己。”如果这是叶芝说的,那我就更相信,帕斯捷尔纳克的晚期风格,就是“智慧诗人”王冠上最后也是最惊艳的荆棘。

帕斯捷尔纳克一边写诗,一边完成了处事策略。他笃定:“谁注定活着受夸奖,谁理当死后遭

辱骂。”于是,该放弃的放弃,该坚守的坚守。年轻时放弃音乐、放弃哲学、放弃莫斯科大学的毕业证书,36岁时放弃三人通信的主导地位(与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再后来放下诗歌,转而翻译莎士比亚的悲剧、歌德的《浮士德》,直到1958年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寒夜深秋提醒自己,“何必惊慌:惶恐之际眼睛自会睁大”,又能明了“造物的法则不足以信,美满童话一样是骗局”,然后面对“盛大而庄严的寂静”:

白皑皑的死的王国,
心神不定地陷入战栗,
我情声向它低语:“谢谢,
你的惠赐,多于对你的祈求。”

我会为他晚年的语言之回归而感动,但不会简单认为是岁月沉淀使得诗风发生改变。我倒愿意相信,诗人无心精雕细刻,或者说诗人放弃早期丰富的联想、连绵的意象,选择简单,乃是身心不胜重负。毕竟他所处的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怀着犹豫前行”的时代。如果说象征派老诗人安年斯基会发出“请告诉我,在思想的痛苦之中/是否还有谁会怜悯我”的慨叹,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黑夜在胜利,王和后在退却”